

# 隐喻的开关: 20 世纪以来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机制研究\*

余媛媛

**内容提要** 斯里兰卡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华侨华人是中斯双边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文章在“旧背景”与“新时代”的情境下,阐释斯里兰卡老华人因同化和涵化出现原生民族特色和情感连接“隐形化”,文化认同趋于“关闭”的现象;论述斯里兰卡老华人和新华侨在文化碰撞和交流中,以及在根基论和情境论作用下,老华人文化记忆被唤醒,从而引发从华人个体认同到社会认同的“开关”机理和“再建构”机制。以盼深化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为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提供经典案例。

**关键词** 斯里兰卡 华侨华人 文化认同 文化记忆

斯里兰卡古称锡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狮子国、已程不国、僧伽罗等指代名。斯里兰卡位于南亚次大陆南端,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是连接东亚航路交会的十字路口。斯里兰卡人口 2167 万,主要民族有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和摩尔人(穆斯林)等。其他民族如伯格人、维达人、马来人和华人等人口数量较少,约占总人口的 0.5%。<sup>①</sup> 2021 年,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华侨华人(包含广义华人概念)约 5000 人(含中资人员约 3300 人)。<sup>②</sup>

中斯友好往来历史已久,两国互动频繁。中斯古代交往主要以宗教、文化交流为主,典型代表事件有:公元 5 世纪,法显赴斯里兰卡游学,取得佛教经典并著《佛国记》;15 世纪,郑和数次下西洋抵达斯里兰卡,有《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为证;17 世纪华人选择斯里兰卡作为避难点。<sup>③</sup> 中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下中斯文化交流的认同机制研究”(项目号:18CMZ03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本文的调研在多方协助下完成,特此感谢中国侨联、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斯里兰卡华助中心、新华社科伦坡分社、斯里兰卡福建商会、斯里兰卡中国传统牙科医师协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1206x0\\_676886/](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1206x0_676886/)

② 2019 年笔者在斯里兰卡田野调查评估华侨华人(包含广义华人概念)数据是 2 万人(含中资企业约 13000 人)。但受复活节爆炸案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截至 2021 年,在斯华侨华人数量大幅下降。

③ 从大事件时间轴上而言,华人进入斯里兰卡的时间,有古代和近现代之分。公元 5 世纪初,晋代高僧法显赴斯里兰卡参访求法两年,著《佛国记》,载斯里兰卡概况、宗教活动与风土人情等内容。15 世纪初,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曾多次抵达斯里兰卡,他的随行通事及翻译马欢著《瀛涯胜览》,载当时斯里兰卡的国家概况、地理位置、风俗习惯、贸易场景,以及斯里兰卡国民对于中国特产的喜爱等详细内容。《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现存于斯里兰卡的国家博物馆)亦是中斯互通往来的历史证明。17 世纪,荷兰殖民者在斯里兰卡大力发展种植园经济,导致劳动力短缺。同段时期,荷兰殖民者因不满在印尼不断扩大的华人群体和华人财富的累积,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发难于华人,爆发了“红溪惨案”。为了解决斯里兰卡种植园劳动力不足和限制巴达维亚华人数增长的问题,荷兰当局将在巴达维亚失业或非法入巴的华人驱逐至斯里兰卡(和班达等地区),至今这批被驱逐的华人具体数量仍未可知。19 世纪,英国殖民者在斯里兰卡为巩固地位和便于劳动力管理,总督弗雷德里克·诺斯对劳工转移作业进行简化,许多华人劳工被从檳城转移到斯里兰卡,继而转移到亭可马利和加勒。外媒曾报道,在托马斯·梅特兰任职斯里兰卡期间,约有 100 名华人男子参与修建了斯的汉密尔顿运河工程。从 1920 年到 1940 年间,华人独立移民开始陆续到达斯里兰卡。

近现代交往主要以商贸、文化和宗教交流为主,典型代表事件有:1952年,中斯《米胶贸易协定》的签订,该协议的签订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里程碑;2013年,在我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斯里兰卡是第一个以官方形式表示支持的国家,两国贸易合作迅速升温,往来人员增多。根据相关数据记录,华侨华人在斯里兰卡的人数:1816年80—100人,1871年40人,1881年49人,1911年约65人,1946年497人,1955年450人,1963年397人,1971年878人,1981年576人,1996—1997年3500人,1999年4000人。<sup>①</sup>相比较而言,古代华人在斯里兰卡居住数据较少,进入地点较为分散。近现代,自20世纪以来华侨华人进入斯里兰卡的数据和可追寻的记忆较为详细,容易观察到他们的人数、行业和社团情况,具有实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故本文以20世纪为时间节点,分析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在发展中的认同变化和社会变迁。

### 一、华侨华人的认同研究概况

华侨华人是一个重要且独特的群体,但由于斯里兰卡长期以来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语言复杂等原因,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相比较而言,学者们对东南亚、欧美和非洲等地区的华侨华人认同研究成果较为丰厚,且具有借鉴性。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华侨华人身份、文化、政治等认同研究,如庄国土以菲律宾前总统奥斯敏纳身世为切入点,分析菲律宾混血华人(Chinese Mestizo)个体或社群的政治倾向和文化认同成因,得出华人族群因利益关系、生活习俗及教育背景的形成与消融机制。<sup>②</sup>陈志明以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划分、沙捞越土著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为切入点,探寻权力、经济与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的内在机制等。<sup>③</sup>二是基于华侨华人社会(社团)、信仰和侨乡等的认同研究,如石沧金对东南亚华人水尾圣娘信仰研究;周大鸣、段颖在梅州南口侨乡基础上对海外华人认同的研究;曾少聪、杜淳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信仰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范畴展开论述,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发展变化等。三是基于华文教育、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认同研究,如内达拉伽穆维·达默迪纳法师从斯里兰卡华文教育的角度对斯里兰卡华人文化进行研究;孔飞力、李明欢对东南亚族群文化、华文教育,以及华文推广的研究;李宝贵对孔子学院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机遇与挑战的研究等。四是基于海外华商形成、发展和网络上的认同研究,如罗杨通过分析柬埔寨华商阶层族群身份构建,分析华人精英群体的调适与认同研究等。五是海外文化、民族政策和侨务政策对华侨华人认同的影响研究,如李安山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非洲华侨华人的优势分析、政策制定和合作策略研究;张秋生、赵昌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下华人的文化融入研究等。

其中,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华侨华人认同中的“华化”“再华化”“同化”“涵化”“异化”等理论研究,如王赓武基于华侨华人文化自觉上的中国情结研究;卡罗琳对东南亚华人“再华化”现象的研究等。<sup>④</sup>二是双重文化认同现象研究,如李其荣以美加新华侨华人为例,提出双重文化认同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探寻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结构和原因;朱桃香等人认为海外华人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中存在加速认同与冲突的二律悖反现象等。三是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变迁和影响因素研究,如李安山以二战后非洲华人对移民

<sup>①</sup> 参见 Nedalagamuwe Dehammadinna, *Sri Lanka Chinese*, Colombo: Samayawardhana Printers( Pvt) Ltd, 2018。参见葛兰《华人经济年鉴》,朝华出版社2001年,第133—134页。另根据《天门人旅居海外史》载,1996年斯里兰卡湖北天门籍华侨华人人数为258人。

<sup>②</sup> 庄国土《华菲混血族群的形成与消融——以菲律宾前总统奥斯敏纳身世探究为例》,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

<sup>③</sup> (马来西亚)陈志明著,罗左毅译《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

<sup>④</sup> Caroline S. Hau, “Becoming ‘Chinese’ — But What ‘Chinese’? — in Southeast Asi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10, 2012.

祖籍国文化的吸收,以及“时间差”(华人迁出时间与身份认同的正反比关系)和“距离比”(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距离的远近与认同大小的关系)分析主体认同大小的内在逻辑关系。<sup>①</sup>郭玉聪对日本神户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分析,得出因日本社会的歧视或不平等对待,导致不同代际之间文化认同仍未明显减弱的结论。四是华侨华人文化认同中的婚姻、语言、墓葬等具体文化元素研究,如郑一省通过对柬埔寨土生华人婚姻类型和仪式分析,肯定土生华人的社会记忆传承与文化适应研究;沈玲通过对印尼雅加达新生华裔语言分析,得出华裔仍保留了对祖籍国文化认同,但代际之间的文化认同呈减弱趋势。五是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个案研究,如代帆、张小倩分别基于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尼邦加岛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文化认同存在变化,且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华侨的进入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华人与中华文化的距离。<sup>②</sup>

从以上内容看,国内外对华侨华人认同研究成果丰硕。从形式上而言,华侨华人文化认同载体有语言、婚姻、葬礼、捐赠、互助等活动。从过程上而言,华侨华人文化认同与利益关系、生活习俗、教育背景、时间差、距离比、经济、政策等因素相关。从结果上而言,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呈现“同化”“异化”“再华化”“再中国化”等特征。这些研究指出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具有可转变的动态性,为本文阐释斯里兰卡老华人文化认同“再建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史料、理论和借鉴基础。但整体而言,有关南亚地区华侨华人新材料的挖掘、搜集和整理,深度阐释较少,有关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自 20 世纪以来,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认同虽然也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但斯里兰卡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等不同代际之间的华人文化认同有着更加细微的变化和规律性。结合前人研究,不禁让笔者思考斯里兰卡华人文化认同的动态机制如何运行?在南亚是否具有关联性和代表性?

## 二、关闭的原因: 斯里兰卡老华人的同化和涵化

20 世纪上半叶,时值辛亥革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天灾人祸使得华人出国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斯里兰卡的老华人主要来自湖北、山东、广东等地。他们通过亲朋相带的模式下南洋,经陆路和海陆辗转定居斯里兰卡。<sup>③</sup>定居后,老华人生活逐渐平稳,但因斯里兰卡是非移民国家,老华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学者们将非移民国家归为“纯粹采取血统主义国家”,即华人无法获得斯里兰卡国籍(总统特权除外),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持有护照、无法享受国家就业保障、没有选举权,以及无法购买土地等,出现了“消极冲突”的无国籍现象。<sup>④</sup>经华人等多方不断地努力和抗争,从 2006 年起,这些持“中华民国”外交护照入境斯里兰卡的“无国籍”华人逐渐加入斯里兰卡国籍。<sup>⑤</sup>因此,从时间、国籍和血统等方面来界定,本文所指的斯里兰卡老华人是 20 世纪以来,已加入斯里兰卡国籍且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外国

① 李安山《二战后非洲华人社会生活的嬗变》,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5 期。

② 参见代帆《融合与维持: 菲律宾华人的认同——基于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田野调查》,载《世界民族》2021 年第 3 期;参见张小倩《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华人文化认同的历史与现状探析》,载《世界民族》2020 年第 2 期。

③ 斯里兰卡老华人常走的三条路线分别是:由湖北天门等地到上海、厦门、香港,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然后到斯里兰卡;由湖北天门经中国西南,到达泰国、缅甸后,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再从印度出发到达斯里兰卡;由山东昌邑等地到香港,然后转海路坐船到达斯里兰卡。除了以上三条线路,也有一些华人辗转至尼泊尔等其他南亚国家,最后定居斯里兰卡(据史料记载,天门华人外出主要分为两条线路,一条由内陆路、海路下南洋,另一条是经汉口、上海、东北、俄国、法国、地中海到印度等南亚国家)。

④ 李安山《华侨华人国籍问题议》,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⑤ 2008 年 10 月 31 日,斯里兰卡议会通过审议华人对斯里兰卡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最终颁布《授予华人公民身份法》(2008 年第 38 号)给予这批华人斯里兰卡公民身份。该法案提出自 1948 年 11 月 15 日起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华人或其后代,如未按以前颁布的任何国籍法获得斯里兰卡国籍,均有权申请加入斯里兰卡国籍。该法案生效后,约 200 名华人申请入斯里兰卡籍。

公民。在登岛一百多年中,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文化认同因同化和涵化发生了明显变化。

### (一) 求生中的同化

同化理论观念形成的历史较长,但直至1900年才逐渐被使用,20世纪前期受到重视,并成为研究移民问题的热点理论。<sup>①</sup>如罗伯特·帕克提出了接触、竞争、调适,最后同化,呈递进、不可逆转的种族关系周期论(Race Relation Cycle)。戈登的七步同化模式更是被广为应用,该模式包含文化适应、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同化、内心接纳同化、行为接纳同化和公民同化阶段,即移民和主流社群间基于价值和权力的冲突逐渐消失。<sup>②</sup>更有学者认为,随着移民后代接受社会的一元文化价值体系,并被吸纳进不分民族的经济、社会、正式生活系统之中,移民的原生民族特色和情感连接将逐渐衰弱,直至最终消失。<sup>③</sup>后随着多元民族文化兴起,这些同化理论逐渐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侨华人在海外移民的历程中确实经历这些过程。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在接触、竞争、调适一系列进程中,经历了文化适应、婚姻同化、身份同化、公民同化等几个较明显的同化阶段,且这些同化围绕老华人的谋求生活而展开。

斯里兰卡老华人谋生行业。据老华人回忆笔录,斯里兰卡老华人早期在科伦坡空普查维基亚等地区落脚和定居。当第一批华人逐渐适应了新家园后,第二批华人通过血缘、宗亲等人际关系构建了连锁移民网络进入斯里兰卡。这种连锁移民网络的形成与扩张大幅度降低了新移民移居斯里兰卡的成本。<sup>④</sup>随着人口增多,空普查维基亚地区市场饱和,老华人逐渐向维拉瓦特和马拉丹发展。早期,他们主要从事卖纸花、镶牙和卖布等行业;后期,他们将业务拓展至餐饮和酒店,且表现较为出色。其中,湖北籍(天门)、山东籍(昌邑)华人多从事镶牙业;山东籍(昌邑)华人多从事餐饮、绸布和百货业;广东籍华人多从事制鞋业(梅县)、制酱油和红花油业等。

斯里兰卡老华人在传统行业中的竞争与调适。镶牙(做义齿)行业在斯里兰卡老华人传统行业中影响力较大。该行业在斯里兰卡可以开拓市场,主要是因为斯里兰卡教育体系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培养本土医师的成本高,牙医看诊费用昂贵,一般家庭无力承担。而老华人镶牙技术多以师徒相带、口耳相传为主,看牙成本相对较低,为一般家庭所青睐。虽然华人的传统镶牙行业满足了斯里兰卡民众需求,逐渐站稳脚跟,但如此一来却影响了斯里兰卡本土“锡兰医学会”成员的利益,二者形成竞争关系。1951年初,锡兰政府颁布法律,所有经营镶牙者同年6月必须参加政府举办的考试,不及格者,停止营业。而主持考试的考官大多是经西方医学体系培养和隶属于“锡兰医学会”的医生与学者,他们的知识体系与依靠师徒和血缘传承的老华人东方知识体系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多数老华人面临英文认读和书写困难。经老华人社团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多方沟通与努力下,锡兰国会最终取消“华人镶牙者必须考试合格才能营业”的法令。<sup>⑤</sup>

竞争和调适的结果是同化加速和人才流失。虽然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人的传统行业得以保留,但该行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竞争和不被官方明确认可的困境之中。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人虽以血缘、地缘等五缘关系在斯里兰卡建构起华人社会,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努力学习泰米尔语

① (美)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依·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② Gordon, Milt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68-71.

③ Ewa Morawska,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5-236.

④ 参见郑一省《侨乡的早期移民模式及华侨华人故乡情结之比较——以湖北天门市和广西容县为例》,载《八桂侨刊》2015年第1期。

⑤ 当时中、斯(锡兰)尚未建交,锡兰华侨商会向最近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求助。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上报至中国国务院,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后,外交部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电函锡兰政府,委婉说明华侨镶牙者不能参加考试的理由。

和僧伽罗语,这是从语言至思考模式上的同化;在子女教育、就业、收入等指标上,获得与主流群体同等的地位;入籍并投身斯里兰卡的选举活动(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人口数量还不足以形成规模性的政治效应)。<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斯里兰卡老华人“逐步获得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从而将自己并入他人的多元文化生活之中”,一旦出现结构同化,其他同化接踵而来。<sup>②</sup>斯里兰卡老华人出现了明显的语言同化、社会经济同化和政治同化。加之华人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除侨领张德焕之子张子华拿到医师资格证,继续以“合法”身份传承牙医行业外,大多数斯里兰卡第三代华人精英已通过高等教育重新择业或移民第三国,人才流失特征突出。

## (二) 适应中的涵化

斯里兰卡华人在经历竞争、冲突、同化和适应的社会进程时,文化涵化伴随而生。当然,有学者也认为涵化不一定导致同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侨华人的涵化和同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sup>③</sup>斯里兰卡老华人在早期文化适应中,语言、身份和婚姻等问题较为突出。从事镶牙和布匹生意的华人发现,语言有助于补牙和布匹售卖,掌握语言较好的人生更容易成功。侨领张德焕因会说一口流利的泰米尔语更是脱颖而出。另外,因为斯里兰卡湖北籍老华人多以家庭为单位“下南洋”,但山东籍华人多以单身汉“闯南洋”,加之斯里兰卡老华人在人口数量并无优势,婚姻同化在所难免。“通婚是文化变迁和涵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通婚的个体不得不在文化上相互适应,他们的后代也受这种相互调适的影响”<sup>④</sup>。第三代斯里兰卡华人大多是华人与斯里兰卡人的混血儿,一般父亲是华人,母亲为斯里兰卡人(以康提人和科伦坡周边地区僧伽罗人居多)。多数华人后裔与斯里兰卡僧伽罗人、摩尔人通婚,或移民第三国与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等通婚。由于母亲在抚养孩子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当地的社会环境需要用到僧伽罗语、泰米尔语或英语,孩子在语言方面比较大地受母亲的影响。这些华人后裔受教育情况良好,可以说流利的英语和僧伽罗语,无斯里兰卡语言屏障。

斯里兰卡第三代老华人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公民认同方面更深入地融入了主流社会,涵化现象比第一代、第二代老华人更明显。斯里兰卡第一代与第二代老华人以私人网络为基础,以亲戚和乡党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围绕喜事请酒、丧事助殓等活动的互助街坊“圈子”。<sup>⑤</sup>这个圈子随着华人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到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祖籍国等地。他们通过这个“圈子模式”进行生活互助和情感联络,维持和保护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因文化涵化,到了第三代华人,他们之间的互动逐渐减少,父辈们的“圈子”模式未得到很好的延续,文化记忆传承的差异性逐渐显现。第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老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强到弱。对于第三代老华人而言,中华文化的相关记忆已经成为与父辈相关记忆的一部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实际影响逐渐减小。

## (三) 留存的文化记忆

斯里兰卡不同代际之间的老华人出现涵化,他们融入了斯里兰卡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系统之中,虽然原生民族特色(或父辈原生民族特色)和情感连接逐渐呈减弱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而是趋于“隐形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记忆和遗留的文化物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作用。文化记忆内含机制,它被具体化、物化,并以象征的形式存储起来,具有稳定性,它们

<sup>①</sup> 参见 R Rumbaut, *Assimil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sup>②</sup> 金毅《文化适应视角下移居者的社会心理适应:多元模型述评与中国经验初探》,载《青年研究》2013年第3期。

<sup>③</sup>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7—66页。

<sup>④</sup> 陈志明著,丁毓玲译《马六甲早期华人聚落的形成和涵化过程》,载《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sup>⑤</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8—38页。

可以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情境,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sup>①</sup> 在斯里兰卡不同代际之间,老华人的文化记忆传承现状总结如下表。

表1 斯里兰卡老华人文化特征简表

斯里兰卡不同代际之间老华人的文化记忆传承现状		
文化特征	第一代与部分第二代老华人	部分第二代老华人和第三代华人及后裔
姓氏	易、吕、常、翟、张、徐、齐等	大部分沿用父辈姓氏,但有所变化,如翟驰舒·詹姆森。
语言	湖北天门或山东昌邑方言居多,少部分人会英语、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书写能力较弱。	华文读写能力减弱,大部分人受过良好教育,僧伽罗语和英语读写能力增强。
节事	互动性较强,经常参加华人圈的婚礼、葬礼、聚会或轮流换庄吃饭;对中国节庆非常了解。	互动性减弱,聚会减少,基本无大规模组织活动(除斯里兰卡中国传统牙科医师协会之外);对中国节庆了解不多。
摆设	因经济原因,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摆件较少。	由于积累,家中摆件(如瓷器、中国画、窗花等)中国文化元素增多。

文化记忆是斯里兰卡老华人对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源影响因素。第一代华人熟悉中国文化,他们保留的中华文化、观念和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物件会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教育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文化记忆共同体。例如父辈有意识地言传身教在斯里兰卡第二代华人的意识中或多或少植下了中华文化的根基。<sup>②</sup> 常新诚父亲背井离乡到达尼泊尔,娶妻生子后,带妻儿赴斯里兰卡谋生。至今 61 岁的常新诚仍记得每次路过警局时,父亲不厌其烦地教授他,华文的“衙门”与“Police Station”一词相对应,此种情境教学法可谓用心良苦,也饱含老一辈华人的思乡之情。<sup>③</sup> 常新诚与父亲具有文化记忆共同体的明显特征,这个共同体是建立在与生者或死者有真实浓厚关系的人的基础上,是一个通过记忆与幸存者发生关联的共同体。<sup>④</sup>

第一代华人灵活地运用他们认为有意义且熟悉的物件、习俗和语言实践文化传承,将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内化成文化符号传给下一代华人。这些带有文化的回忆和物件并不会消失,只是在特殊语境中“隐形化”,实际上它们承载着文化认同、文化符号,以及第一代华人实践中履行的一种社会职责。这些文化记忆和文化物件(文化符号)为文化认同的“打开”奠定了情感基础。

### 三、打开的动作:文化交流中根基论/情境论的新发展

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文化涵化与对华文化记忆成反比关系。随着“时间差”的增大,斯里兰卡老

① 参见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Springer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2011, pp. 15-18.

② 李其荣、姚照丰《美国华人新移民第二代及其身份认同》,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1期。

③ 此内容是2019年4月,在斯里兰卡加姆珀哈对常新诚及其妻子进行的访谈材料。

④ (以)阿维夏依·玛格利特著,贾海仁译《记忆的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华人出现原生民族特色和情感连接“隐形化”,文化认同逐渐减弱趋于“关闭”的现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斯里兰卡(锡兰)建交。两国互动增强,新华侨陆续到达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老华人与新华侨文化交流机会增多,打破了因“时间差”而导致文化认同减弱的僵局。早期,因中斯两国发展和合作需要,一些人以公派身份进入斯里兰卡,进行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后中国企业制度改革,一部分人选择返回中国,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继续留在斯里兰卡创业,留下创业这部分人的身份也由公派人员转变成华侨。<sup>①</sup> 21 世纪斯里兰卡政局逐渐稳定,加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斯合作的基建和援助项目迅速增加,旅游等周边产业迅速发展,斯里兰卡华侨人数进入高峰期。<sup>①</sup> 从时间、外出身份、国籍等方面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斯里兰卡籍华人较少,而华侨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故本文所指的斯里兰卡新华侨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居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公民,不包括中国公民出国留学生或因公外派人员。

### (一) “旧背景”与“新时代”的碰撞和交融

斯里兰卡新华侨的海外发展道路是一个基于老华人“朋带友,亲带乡”的升级版模式,老华人背井离乡的外源性因素多是因为天灾人祸,他们颠沛流离辗转到达斯里兰卡,谋生手段较为单一,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的。而新华侨“走出去”的外源性因素多是为了顺应时代,在祖国发展大背景下,以企业家、投资者的身份谋求发展。两者外出背景不同,产业结构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老华人更多是以具体的技艺服务于斯里兰卡,打造了良好的民意基础,那么新华侨则在更多层面、更广范围上参与了斯里兰卡的一些重大项目,对斯里兰卡社会经济影响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背后还有侨联、侨乡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力量的帮扶与支撑。科技网络与信息共享的发展增强了新华侨投资力度,逐渐实现以原来依靠熟人社会投资模式向现在契约型投资模式的转变。

斯里兰卡老华人与新华侨“走出去”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外源性差异。新华侨在新中国背景下成长,社会生活习惯与当代中国文化更相近,他们在海外务工时因有华联会、大使馆、侨乡等力量的支持和帮扶,拥有较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对于有着一定中华文化基础的斯里兰卡老华人而言,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具有带动性和感染性。斯里兰卡新华侨尤为注重围绕饮食而展开的节庆活动,这与斯里兰卡第一代和第二代老华人社会“圈子”有相似之处。如新华侨看重中秋节和春节,他们举办大型聚餐晚会,邀请老华人参加,创造了交流空间,为新华侨和老华人之间进一步的生意、升学和合作交流奠定了信息基础。当饮食文化的符号性和社会功能合二为一时,新华侨社会生活中的“带动性”文化认同逐渐彰显。这种“带动性”不仅实现了家庭、家族“小圈子”传统节庆私密空间向华侨华人“大圈子”公共空间的转化、文化记忆与地方性知识交融,还构建了新的文化空间,使得传统节庆仪式性增强,生命体验感增加。<sup>②</sup> 新华侨在基于饮食文化而展开的节庆活动中,突破了老华人以家庭为“圈子”的社会互动模式,增进了老华人和新华侨的文化互动,拉近了华侨华人情感的同时,也扩大了二者的伙伴关系。

### (二) 文化记忆的唤醒

回顾斯里兰卡第一代华人,他们的历史背景、文化、地域和血缘等“客观特征”突出,在“排斥”过程中形成了“我者”和“他者”的差异,族群认同和文化边界清晰。随着不同代际的老华人在外表、语言、信仰等方面逐渐融入斯里兰卡社会,族群边界逐渐弱化。当外部环境不利于生存的时候,

<sup>①</sup> 2015 年斯里兰卡大选后,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任总统,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任总理,随后大批中资项目被停工,中方撤回务工人员,损失巨大。此阶段,华侨投资环境恶化,部分华侨撤资回国,人数有所减少。2019 年斯里兰卡科伦坡发生复活节爆炸案,从事旅游、酒店和餐饮业的华侨受到影响。

<sup>②</sup> 参见李牧《族群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与融合——纽芬兰华人春节庆祝的历史、文化表演与仪式过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

在同化和文化涵化的作用影响下,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逐渐在地化,文化记忆和文化情感在代际中“隐形化”,文化认同逐渐减弱趋向“关闭”。这里使用“关闭”一词,而非“消失”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斯里兰卡老华人国家政治认同随着公民身份改变而发生改变,族群认同边界也逐渐模糊,但是上一辈老华人教授的文化记忆、传承的文化物件,以及潜移默化的观念影响并未消失,即文化根基还在。这些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不同代际之间斯里兰卡老华人文化认同的真实性。

斯里兰卡新华侨的带动性和感染性有益于老华人文化记忆的唤醒,被唤醒的文化记忆为斯里兰卡老华人文化认同激活和创新设置了一个开关,其机理主要是因为斯里兰卡老华人具有一定的文化记忆基础,而文化具有相通性。这个相通性是基于族群文化根基上产生的,与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族群认同是人类依据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宗教、血缘、行为、生物外貌等的“客观特征”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更偏向情感和认知等“主观成分”认同。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斯里兰卡华侨华人都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具有同源性;从文化角度而言,二者具有相通性;从国籍而言,斯里兰卡老华人属于斯里兰卡公民,斯里兰卡新华侨是中国公民,两者政治认同不同。虽然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看似有诸多不同,但三者实则相互关联,且有交叠的地方,其中文化认同一方面与族群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是二者的“中介形式”。<sup>①</sup>从某种角度而言,在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中,新华侨文化认同的带动性和感染性增进了老华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打通了族群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的隔阂,突破了老华人文化认同“隐形化”现象,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文化认同机制趋向于逐渐“打开”状态,下文将以翟驰舒·詹姆森个案为例阐释文化认同演变。

### (三) 个体认同的心理实践

翟驰舒·詹姆森于1963年出生斯里兰卡,现任斯里兰卡中国传统牙科技师协会会长,属第二代老华人(华裔)。他的父亲1911年在山东出生,28岁前往斯里兰卡,母亲是斯里兰卡人。<sup>②</sup>据翟驰舒·詹姆森回忆,其父亲曾是军人,对孩子们要求严格,做得一手好吃的中国菜。儿童时期,翟驰舒·詹姆森因外貌特征不同而受到嘲笑,为避免自己被同学异类化,他蓄着浓密的头发和胡须,乍看与斯里兰卡僧伽罗人无异。其行为机理是社会环境对华人个体心理和认知产生影响,个体因生存和利益等因素努力融入社会。

成年后,翟驰舒·詹姆森从父亲手上学到传统镶牙手艺,并以此为生。若无后续文化交流事件,翟驰舒·詹姆森可能会因文化涵化而逐渐淡化父方文化特色以及与中国的情感连接,但2016年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基于传统行业培训背景下,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主办,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协办,翟驰舒·詹姆森等人获得机会参加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义齿加工中心提供的义齿加工及牙齿修复等专业培训,以提升斯里兰卡华人传统镶牙技术,培训完后他们返回其父祖籍山东探访故乡。与此同时,翟驰舒·詹姆森更加积极地加入新华侨节庆活动,融入更大的华人社会“圈子”,在圈子中作为桥梁构建新的斯里兰卡老华人与新华侨互助模式。

这一系列文化交流“大事件”不仅缓解了斯里兰卡老华人生计通道困境问题,也激发了他与中国有关的符号性根基记忆(Fundierende Erinnerung)与体验性生平记忆(Biographische Erinnerung)的交叉叠合,深化了翟驰舒·詹姆森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渐打开了文化认同的隐形开关。<sup>③</sup>在文化交流语境中,翟驰舒·詹姆森源于血统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增强,谋生的技艺和社会认可度也得到

<sup>①</sup>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sup>②</sup> 此内容是2019年3月,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对翟驰舒·詹姆森访谈材料,核对验证整理而来。

<sup>③</sup> (德)杨·阿斯曼著,金寿福等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47页。



增强。在积极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情感和利益都得到满足,即根基论和情境论同时成立,即这种文化认同借由历史经验与象征性的文化活动而凝聚产生,进行“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实现了根基论与情境论的折中及新的发展。自此,个体传承的文化记忆(根基论)与在华经历(情境论)结合,产生对华文化认同的“开关”,文化认同逐渐“打开”和重新构建。

#### 四、开关的后续:情感认同增强和实践

系列的积极文化交流通过文化共情唤醒了斯里兰卡老华人长时记忆系统(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将特定对象与相应评价信息联结,这种联结就会导致相应的评价信息被提取出来,形成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主观倾向,即积极的态度被激活,影响个体在相关情境中的行为,而这些认知和行为是个体在实践文化认同“再构建”的内在逻辑。<sup>①</sup>故2019年笔者见到翟驰舒·詹姆森时,他已与媒体上报道的形象大不相同,干练的短发,整个脸庞看上去东亚人特征明显。与此同时,他督促女儿学习华文,希望女儿能够到中国继续深造,传承中华文化。

##### (一) 个体情感认同的表征

在文化交流中,斯里兰卡老华人的个体情感认同表征既能站在斯方和中方角度主动理解、认可双边文化,也能将个体情感积极表达,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2020年3月,翟驰舒·詹姆森组织中国传统牙科技师协会参与康提佛牙寺的牙科义诊活动,以回馈斯里兰卡当地社会。3月8日,翟驰舒·詹姆森和另外8位牙科技师代表赴康提佛牙寺与大长老会面,商谈义诊活动。<sup>②</sup>

2020年3月,斯里兰卡新冠病毒患者增加至100人以上,斯里兰卡医疗资源的极度短缺。斯里兰卡华人“新社团”(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发起“支援斯里兰卡抗击疫情爱心捐款”的义捐活动。正因为前期中斯文化交流活动基础良好,个人的表征扩大到集体表征,“老社团”(中国斯里兰卡传统牙科技师协会)主动响应号召参与捐款活动。“新社团”与“老社团”互动增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以翟驰舒·詹姆森为例,他的外形变化和对子女教育上的要求,组织团队义诊、义捐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个体文化记忆唤醒与情感认同增强的文化认同实践,从而又影响集体认同的经典案例。

##### (二) 个案到群体案例的多元文化认同“再建构”

以上是翟驰舒·詹姆森的个体情感认同增强后的表征。然而,涂尔干认为个体表征(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有着严格的区分,他强调个体表征属于心理学范畴,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范畴。莫斯科维奇在此基础上,以“社会性”强调表征概念的“动态性”,以区别涂尔干强调的集体表征的“复合性和静态性”。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越频繁,文化分裂的概率越大,分裂的文化就意味着新的社会表征出现,即表征在文化缺失内容上重新建立新的动态,对这些新事件加以熟悉和解释,这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再构建的过程。而“一带一路”倡议为频繁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斯里兰卡老华人与新华侨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增多。除了翟驰舒·詹姆森的个案,其他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出现了复苏和类似“再建构”现象。

如中国礼品店老板徐福贵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与斯里兰卡占星学联系在一起,把中斯共有的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产品中,既满足了斯里兰卡顾客的求新心理,也满足了

<sup>①</sup> 参见 RH Fazio, J Chen, EC McDonel, SJ Sherman, “Attitude Accessibility, Attitude Behavior Consistenc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Object-evalu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o. 18, 1982.

<sup>②</sup> 该内容源于2020年第一季度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工作小组小结,感谢赵定成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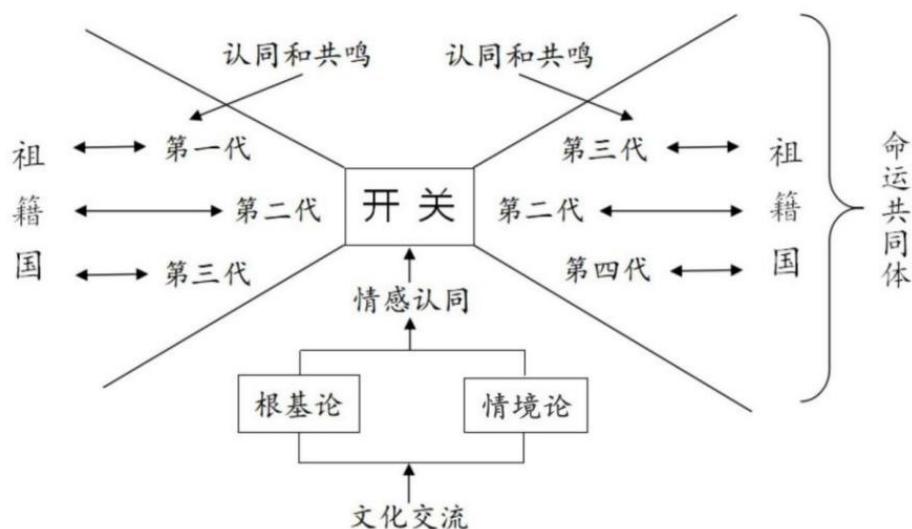
中国游客的审美需要。此举不仅是在斯里兰卡占星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五行”文化的“再建构”，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实践，将文化与资本进行结合实现中国风水文化在地化的衍化。从事牙科材料经营的吕锡忠在新时代背景下，借自己一口流利的中文，将自己近95%的货源渠道由日本、德国等国家转向中国，这也意味着在斯里兰卡牙医技师手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材料来自中国。此举不仅是商贸活动的转向，更是扩宽中斯商贸交流活动，加深斯里兰卡部分行业对“中国制造”文化认同的一个积极风向标。从事布匹生意的常文礼给大儿子起名叫“国富·斯华·常”，“斯”代表斯里兰卡，“华”代表中华，“国”代表国家，“富”代表富强，即他希望大儿子能让斯里兰卡国家富强；二儿子叫“国平·明华·常”，“国”同样代表国家，“平”代表和平，“明”代表证明，“华”也代表中华，寓意斯里兰卡国家安定，不要再像常文礼自己一样生逢乱世，他希望自个人和国家都可免于沧桑和磨难。此举不仅是华人对斯里兰卡富强、和平的期望，更是通过对子女字辈和名字的“再建构”以传承中华文化。<sup>①</sup>“再建构”的案例太多，不一而足。

### (三) 华侨华人社会文化认同的模式

当现代性与大量“隐形化”的传统相关联时，个体表征呈现多元化特征，而表征的目的就是将不熟悉的事情变得熟悉起来，是一种靶向和客观化的建构过程。<sup>②</sup>因此，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新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解释被构建，多元化的表征以知识生产的形式被集体保存，转化成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斯里兰卡新华侨在与老华人接触的时候以文化记忆做基础，文化同理心做中介，倾向于站在对方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思考、理解，从而产生认同、行动。新华侨和老华人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记忆与血缘根基和利好情境为双方交流、升温情感认同创造了基础。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社会文化认同模式即为一个“趋于关闭(隐形化)——逐渐打开(再建构)”的过程。虽然每个个体认同的经历和倾向性不同，但带有文化记忆的根基论和带有目的意义的情境论会增进情感认同，从而打开文化认同的开关，更新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文化记忆，激发更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如图1)。

图1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认同“开关”机理图



① 此部分和文中老华人案例参见余媛媛《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口述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年。

② 参见〔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著，管健等译《社会表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9页。

## 五、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的条件与不确定性

在中斯友好往来的新时代背景之下, 利好环境支持与双边友好互动为文化认同“再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但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再建构”具有其独特的文化逻辑和不确定性。

### (一)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再构建”的条件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有诸多文化“再构建”的案例, 究其原因是华侨华人的中国情结具有深根性, 王赓武认为中国海外华侨华人与其他移民不同,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中国移民在定居的国家同化似乎有更大的困难”, 中国情结为华侨华人接受现代中国文化( 崛起后可爱、可敬的文化)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sup>①</sup> 白鲁恂认为中国不仅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建立在世界上一个伟大文明的基础上, 这一事实给了它的政治文化以过渡的力量和持续时间。“中国性”的力量, 即“中央王国综合症”或“中央国家情结”——导致了一种持久的优越感。<sup>②</sup> 虽然斯里兰卡老华人在社会环境作用下, 文化认同发生变化, 甚至发生被迫同化, 但因中国情结具有深根性, 文化基因容易传承给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或第四代华人。这些华人及其后代以特有的方式吸收中国文化符号, 如继承的瓷器家业、名字、食物记忆等。虽然因涵化和时间差等原因, 老华人文化认同在代际之间会逐渐减弱、隐退, 但百年内却不会彻底消亡。文化认同的“隐形化”与中国情结的“深根性”具有内在逻辑关系, 因为“深入”所以不容易“褪去”。

### (二)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再构建”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文化的“深根性”是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再构建”的优良条件, 但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保留度与个体自我归类紧密相连, 所以在文化认同“再构建”中仍有差异性和不定性。例如, 极少数老华人在动荡社会中经历过不公的待遇, 他们的记忆仍然停留在旧社会时期, 对祖国某些特定文化和华人群体产生畏惧感和排斥感。当然, 大部分斯里兰卡老华人有选择地将祖国文化元素纳入他们的现有的文化体系中。例如, 他们更强调父母的祖国文化, 并且表示第二代成员有意向性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元素, 同时也会修改许多元素。这些信息被选择性地用于在普遍的历史、结构和个人约束下的种族身份的社会构建。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在不同背景下, 有选择地保留、调整和纳入中华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某些要素, 他们通过独特的实践, 并将这些持续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 构建了新文化和身份认同, 从而实现了文化和身份的“再建构”。

文化交流中, “再构建”的目的并非促使华侨华人“再华化”或者“再中国化”, 而是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创新。在华侨华人居于少数人口的南亚国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血缘上的融合, 教育、语言、信仰等文化身份会因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渗透与融合而变得含糊不清。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会促使文化认同出现“再建构”现象的发生, 这个“再建构”过程并非消减或增加一方文化的影响, 而是彼此取长补短, 相互吸收对方的优良特性, 更新、修正、补充和创建新的文化记忆与认同, 从而形成良性的文化交流体系。<sup>③</sup>

## 结 论

纵观历史,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史是一部书写着文化交流、劳工输出、躲避灾难和谋求发展的历史。自 20 世纪以来, 虽然斯里兰卡老华人与新华侨国家政治认同不同, 但因中国文化情结的深根

① (新加坡) 王赓武《中国情结: 华化、同化与异化》,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1 年第 5 期。

② Tu Weim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③ 参见周南京《文化融合是历史的选择——海外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变异》, 载《东南学术》, 1994 年第 4 期。

性,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的延续性使得他们的文化认同具有相通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有“隐形化”向“再构建”过渡的趋势,这个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斯里兰卡老华人下南洋的“五缘”脉络清晰,与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关系密切,有迹可循。但因长期以来,传统行业频受打击,导致斯里兰卡华侨华人与南亚、东南亚华侨华人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地缘相近、神缘相通的关联逐渐减弱。目前,他们因同化和涵化已经向上、平行或向下融入斯里兰卡社会。其次,文化传承实践有待提升。从文化传承看,华侨华人的民族文化出现“在地化”和“文化融合”现象,这是斯里兰卡本土传统与外来中国文化的实践与承续,且呈现多元化现象。但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文化传承和实践只是个案突出,并未形成社会主流。最后,从业缘和地缘上而言,虽然老华人和新华侨叠合“一带一路”的商业契机,形成了“义”(援助)和“利”(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但老华人的参与度和互动的影响力,以及新华侨文化交流的带动性、持久性和策略性仍有待提升。

虽然斯里兰卡华侨华人相对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或美国等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家而言,在人口数量上并无优势,但对他们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我国对重要合作国,以及南亚区域的了解。斯里兰卡老华人的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相似性,即他们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相同的外出缘由,相同的在华祖籍地,相同的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了对华文化认同的初步关联。与此同时,新华侨与老华侨的互动研究或许可以对南亚“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传播的方式渠道、文化认同的问题与对策、交流合作的机制与原则进行观照与反思。南亚“海丝”沿线国家具有民族较多、宗教复杂等特点,我国要在该地区进行任何重大的布局,都要“以侨为桥”和“以人为脉”为前提,而目前我国对该地区华侨华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亟待加强。

**Abstract** Sri Lanka and Chin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exchanges, with overseas Chinese acting as important envoys of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ld background” and “new era”,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origin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China of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became invisible due to assimilation and acculturation,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ended to “shut down”; and discusses the fact that in their cultural collisi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in Sri Lanka, as well 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ordialist and Circumstantialist theories, cultural memory of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has been awakened, thus triggering off the “switching” mechan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that transform individual identity into social identity among overseas Chinese in Sri Lanka.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ri Lanka and provide a classic case for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Asia.

(余媛媛 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昆明 650091)

(责任编辑:邓颖洁)